

Urban Cultural Ecology

城市文化生态学

周 膺 吴 晶 /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C912.81
20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Urban Cultural Ecology

城市文化生态学

周 膺 吴 晶 /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文化生态学 / 周膺, 吴晶著. —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81140-689-4

I. ①城… II. ①周… ②吴… III. ①城市文化—文化生态学 IV. ①G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0137号

城市生态文化学

周 膺 吴 晶 / 著

策划编辑 赵 丹

责任编辑 王黎明

版式设计 周 膺

责任印制 汪 俊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198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 (传真)

排 版 杭州高腾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345千

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40-689-4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804227

大汗已经在翻看另一些绘着在噩梦和咒诅中吓人的城市的地图：艾诺克、巴比伦、耶胡兰、布图亚、勇敢的新世界。

他说：“如果我们最后只能在地狱城上岸，那么，一切努力都是白费的，而它正好就在那里，也就是海潮牵扯我们卷进去的、不断收缩的旋涡。”

可是，波罗说：“活人的地狱不一定会出现；要是真有的话，它就是我们如今每日在其中生活的地狱，它是由于我们结集在一起而形成的。我们有两种避免受苦的办法，对于许多人，第一种比较容易，接受地狱并且成为它的一部分，这样就不必看见它。第二种有些风险，而且必须时刻警惕提防：在地狱里找出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习认识他们，让它们持续下去，给他们空间。”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Italo Calvino) 《看不见的城市》

当我们超越我们自己这一代人的墓地而思考时，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类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什么样的人。

〔意〕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序 言 自然的终结、人文主义的终结与城市文化生态学

继饥荒、瘟疫、战争之后，人类正在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生态危机。这场新的灾难是人为造成的，它取代自然灾害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威胁。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后，以人工生产系统改变了自然生态系统，至今已超出了地球生态载荷的极限。首先是农业革命大范围改变了地表生态系统，导致全球性的荒漠化，使地球循环系统特别是所有生物系统的循环不断恶化，出现严重的生物灭绝灾变。这一历史沿续了数千年，目前进入最为恶劣的阶段。其次是18世纪发生的工业革命对地表和高空三维生态系统的全面破坏，不仅像农业革命那样局地性改变大陆生态系统，而且使整个海洋生态系统难以正常运行，并通过水循环系统和大气循环系统改变全球气候和污染全球环境。工业还将农业系统改造为“石油农业”，即使农业实质上变成了“工业化农业”，以无比的强度污染生态环境。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比尔·麦克基本（Bill Mckibben）、克劳斯·科赫（Claus Koch）等因此而讨论“自然界的终结”（The End of Nature）命题，他们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原本意义上的自然界终结了——“自然不再是自然”^[1]，人类借以行事的传统也终结了。“自然界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一个自然环境消灭了的世界，而是指在物质世界的各个方面，几乎没有未受人类干预影响的领域。”^[2]人类日常生活中所遭遇到的物质内容，几乎都

^[1]Anthony Giddens,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p.59.

^[2]Anthony Giddens & Christopher Pierson, *Conversations with Anthony Giddens: Making Sen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p.207.

^[1]Anthony Giddens,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p.58.

^[2]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何博闻
译，译林出版社，2004
年，第99、97页。

^[3]比尔·麦克基本：
《自然的终结》十周年
纪念版作者序，孙晓
春、马树林译，吉林人
民出版社，2000年。

受科学技术和人类活动干扰，几乎都“不再是自然”了。“我们可能曾认为‘环境’即为自然世界，现在已经不再只是这样了，许多过去属于自然界的事物，现在既可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也可能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1]按照贝克的解释，“自然的终结”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在空间、现实意义上，指没有受到人类影响的纯自然界已经不复存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直接或间接地留有、刻下了人类的痕迹，每一种生物都深刻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其二，在变化、发展意义上，指不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纯自然变迁、纯客观变化的终结，人类活动已经深刻影响了自然界的发展方向、变化速度。全球变暖、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增加与人类人口数量的增长、实践能力的提高具有正相关性。其学理内涵是指：一为客观自然的人化，自然已经成为被人所掌控的、实现人的各种目的的实验场。自然“是一个在系统中循环和被利用的自然，所以即使在客观的（自然）科学家的客观的手里，自然都变成了政治性的”。二为原来被人们所把握的人与自然互动的规律被人的活动所打乱，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新的人所尽知的、不确定的新特点、新趋势。“这意味着，自然不再能被放在社会之外理解，社会也不再能被放在自然之外理解。”^[2]1999年麦克基本在其《自然的终结》出版10周年纪念版序言中写道：“当我在80年代末撰写《自然的终结》时，我进行了两方面的观察。首先，我们错误地表述了时间——我们曾经认为地球是在无限缓慢地改变着，但事实上这一改变现在正在加速——作为我们自身的改变而导致的后果，地球的改变是急剧的、危险的和神秘的。其次，我们的有关空间的概念也是错误的——我们曾经认为人类是渺小的，而地球是巨大的，但是，在我们生活的时代，相反的情况已经发生了。”“人类第一次变得如此强大，我们改变了我们周围的一切。我们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终结了自然，从每一立方米的空气、温度计的每一次上升中都可以找到我们的欲求、习惯和期望。”“我们再也不能认为我们自己是被巨大的力量抛来抛去的物种——现在，我们就是那些巨大的力量。飓风、雷暴和大雷雨已经不再是上帝的行动，而是我们的行动。”^[3]随着工业社会的推进，自然已经不可挽回地终结了，纯自然已经深刻地转换为文化的自然、社会的自然、政治的自然。

“自然界的终结”使生态问题充斥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从海平面到对流层顶端这段几乎维持所有地球生命的大气层仅11km左右，挤满了所有陆地生物。其间的空气成分主要是N₂（78%）和O₂（21%），其次为Ar（氩气），CO₂仅为微量。红外光和热能轻易穿过O₂和N₂，CO₂则不同，它如同一张裹着地球的毛毯，把热能捕集于大气中。CO₂

和含碳原子的CH₄（甲烷）是主要的温室气体，它们如大棚蔬菜温室的玻璃或塑料一样捕捉太阳的热能。如果CO₂太少，地表将成冰原，过多则将导致气候过暖。目前全球每年向大气排放的CO₂300亿t，与此同时空气中的颗粒物、SO₂、CO₂、H₂S等污染物也大量增加。另外，全球已有30%的土地因人类活动而退化，每年流失土壤约240亿t。每年流入海洋的石油1000多万吨，重金属几百万吨，还有数不清的生活垃圾。人类改造了75%的无冰雪覆盖的土地，19世纪中叶以来修建的几千座水坝已经彻底改变了地球的地表径流。一半的森林被砍伐殆尽，并且继续以每年约1700万hm₂的速度消失。生物灭绝的速度达到地球历史背景速度的100—1000倍。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安东尼·D. 巴诺斯基（Anthony D. Barnosky）为首的15个国际组织22名科学家在2012年6月出版的《自然》杂志上联名发表题为《地球逼近生态临界点》的研究报告称，人类已占用了43%的地表，到2025年这个数字将达到50%，其中包括南极洲、格陵兰岛和其他通常不适宜居住的地区。小型生态系统研究已经表明，一旦一个地区50%的土地发生改变，往往会丧失生物多样性，动物和植物也将面临灭绝的危险。^[1]2007年8月16日法国《世界报》报道的美国康奈尔大学生态与农业学教授大卫·皮门特尔（David Pimentel）等人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全世界大约40%的人类死亡事件与水、空气及土壤污染有关。其中因直接空气污染死亡的约300万人，因直接水污染死亡的约2500万人。每年因癌症死亡的则接近800万人。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约死亡7000万人。“不断地监视你所饮用的水质：不管是什么来源的水，都可能被污染。不要以为瓶装水是安全的，尤其是用塑料瓶包装的。在家里需将水蒸馏净化，因为自来水大多都被污染。对吃的东西要小心谨慎。不要吃鱼，因为鱼是一大污染源。也不要吃动物脂肪，不管是奶酪、黄油还是肉类中的脂肪都要避免。要购买天然种植的水果和蔬菜，或者自己培育。要尽量减少塑料与食品的接触。母亲们应当考虑避免用母乳喂养孩子，因为这样会使婴儿接触大量污染物。每天都要经常地洗手，因为污染物总是附在室内的任何表层上，人手触摸就沾上。在住宅周围或花园里，不要使用杀虫剂——不要到使用它们的人家里去。在弄清一家商品或超级市场是否向货品上喷洒杀虫剂（这是普遍做法）之前，不要在那里购物。要远离高尔夫球场，因为那里污染严重，甚至比农田上还要严重。”^[2]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笔下的“荒原”是最富20世纪特征的意象之一。艾略特写道：“我们唯一的健康就是疾病……整个地球都是我们的医院。”^[3]这里，“死树毫无阴凉，蟋蟀难解愁闷，枯石不带水声”。面对这死寂的“荒原”，艾

^[1]Anthony D. Barnosky, Elizabeth A. Hadly, Jordi Bascompte, Eric L. Berlow, James H. Brown, Mikael Fortelius, Wayne M. Getz, John Harte, Alan Hastings, Pablo A. Marquet, Neo D. Martinez, Arne Mooers, Peter Roopnarine, Geerat Vermeij, John W. Williams, Rosemary Gillespie, Justin Kitzes, Charles Marshall, Nicholas Matzke, David P. Mindell, Eloy Revilla & Adam B. Smith, *Approaching a State Shift in Earth's Biosphere*, NATURE, 2012, 486 (7401).

^[2]Anthony Giddens & Christopher Pierson, *Conversations with Anthony Giddens: Making Sen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p.227.

^[3]Thomas Stearns Eliot, *The Waste Land*, in Emory Elliott, ed., *American Literature: A Prentice Hall Anthology*,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1, p.1525.

^[1]Thomas Stearns Eliot, *The Waste Land*, in Emory Elliott, ed., *American Literature: A Prentice Hall Anthology*,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1, p.1525, p.1508.

^[2]克劳斯·科赫：
《自然性的终结》，王
立君、白锡堃译，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184页。

^[3]Anthony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p.224.

略特认为出路只有一条：“在群山之中，在那儿，你才能感到自由。”^[1]然而这种理想在现时代也变得渺茫。

“自然界的终结”不仅指人类生活的外部环境不自然了，而且也指人类的“内部环境”变得日益不自然。全球人口超自然增长，已经超过70亿。欧洲人口学家计算，过去400万年里一共有800亿人出生，这些人一共活了2.16万亿年。这2.16万亿年中，28%在1750年之后，20%在1900年以后，13%在1950年之后。尽管20世纪在人类历史上只占1/40000，却占了人类总存活年数的1/5。人类的生态足迹已经超出地球的载能。科赫在《自然性的终结：生物技术与生物道德之我见》一书中对基因、胚胎等生物技术的发展给人自身自然性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反思，认为“现代市场社会的文明化和一体化力量，归根到底是基于利用逻辑”^[2]。在这种利用逻辑、利益逻辑的支配下，胚胎、基因等生物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人们对自身的性别、寿命、血缘关系等都可以进行自主控制，使人类从繁殖开始就游离于自然。基因的重组虽然对于治疗遗传缺陷的病例具有重要的医疗价值，但也使人类的血缘关系失真。试管婴儿和克隆技术很有可能使人类生命的生产技术化、工业化。由此，自然包括人自身的自然性生命日益成为非自然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而身体的不再自然是由人的主观意识的反射实现的，因而自我不再由外在的自然规定，而是由内在的自我意识来规定，“拥有自我就是拥有自我意识”。“在传统正在消解的社会中，建立一种作为持续过程的自我比以前更为必要。生活规则不再是宗教理想的垄断物，它已经扩散到所有希望通过反射性运用饮食和医疗知识的人的未来生活中”^[3]。

贝克、吉登斯等以“自然的终结”为理论原点建构起风险社会理论。吉登斯将风险分为两类：一类是“外部风险”。这是在工业社会存在的头200年里占主导地位的风险，意味着可能遭遇的意外打击，如疾病、伤残、失业等。这种风险虽然严重，却因经常发生而可以预料，也可通过保险来防范。另一类风险则是“人造风险”。它存在于自然和传统消失之后，是由人的发展、特别是由科学技术的进步所造成的。对于人造风险，历史没有提供前车之鉴，人类甚至不知道这些风险是什么，就更不用说对风险的精确计算了，这就使人类陷入到前所未有的风险环境之中：科学技术发展所引起的风险无法通过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为追求确定性而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却引起更大、更长期的不确定性。“人造风险正在生活的大多数方面扩展，它所涉及的科学与技术的一个方面，是工业社会的早期理论家们基本上没有预见到的。科学与技术所造成的不确定性，

与它们所消除的一样多；这些不确定性也无法通过科学的进一步推进，以任何简单方式来解决。人为的不确定性直接侵入到个人和社会的生活之中——它并不囿于集体性的风险环境。人们再也不能依靠传统来确定它，在一系列给定环境中如何行事了。”^[1]贝克也认为，工业发展、科学进步等人的活动使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呈现出新变化、新特点，但这些新特点、新趋势并没有为人类所尽知，因而呈现出鲜明的不确定性。贝克将这种既是“人为”又是“不确定”的“世界状态”称为具有“人为的不确定性”状态。

以“自然的终结”概括现代性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确实抓住了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基础性问题，但其中也隐含着逻辑悖论。一方面，人类文化造成“自然的终结”；另一方面，终结了的自然又无法为人类文化所控制，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人类文化自身的终结，也可以说是近代以来确立起来的人文主义的终结。没有人能把人文主义的历史功绩一笔抹杀，但学术界对它“正、反、后”的评断。事实上，早在19世纪就出现了反人文主义的倾向。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敏锐地指出，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是“理论上反人文主义者”的始祖。“1845年，马克思与一切理论彻底告别，只要这些理论把历史和政治建基在人的本质之上……与所有哲学人类学或人文主义的决裂远非小事一桩，它是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早期的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哲学在一切论域和论点（它的‘知识论’，它的历史观念，它的政治经济学，它的伦理学，它的美学等）都依赖人性论（或人的本质论）……马克思把这个假说的有机体系都扬弃了。”^[2]阿尔都塞虽然没有深入阐述马克思所扬弃的人性论或人的本质论具体是什么，但明确地把人性论（人的本质论）与哲学人类学或人文主义相提并论。马克思之所以扬弃“人文主义”，是因为他不相信有不变的人性和永恒的本质。说到底，人文主义有着太厚的宗教色彩，它让“理性”的人对人相信到“非理性”的程度。大卫·厄伦费尔德（David Ehrenfeld）在《人文主义的傲慢》一书中指出：“人文主义是我们时代的主流宗教……扎根于现在世界文化的中心。”“在这个反讽的时代，这是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人文主义宣扬并称赞批判的智慧，可是当它自身最需要这一智慧时，它最终却没有能够运用这一智慧，通过衡量人与环境之间互动的得失，来评判人文主义自身的信仰。反馈和分析是人文主义的工具，现在它们要被用在人文主义自己的身上了。”书中还列举出人文主义的7条主要和次要假说，其中包括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由人来解决、许多问题可以由技术解决、一些资源是无限的或所有有限或局部资源都有替代

^[1]安东尼·吉登斯：
《风险社会的政治》，
载安东尼·吉登斯、克里
斯多弗·皮尔森：《现代
性：吉登斯访谈录》，
尹宏毅译，新华出版
社，2001年，第195页。

^[2]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 1969,
p.227.

^[1]David Ehrenfeld, *The Arrogance of Human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 p.15, p.263.

^[2]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Smith,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89, p.387.

^[3]Ihab Hassan, *Prometheus as Performer: Toward a Posthumanist Culture? A University Masque in Five Scenes*, *GEORGIA REVIEW*, 1997, 31(4).

^[4]赵白生:《生态主义:人文主义的终结?》,《文艺研究》,2002年第5期。

物、人类文明必将幸存等。对于这些假说,厄伦费尔德运用他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从神话和现实两方面予以驳斥。在书的最后,他发问道:“人有没有准备好走出人文主义的藩篱?时代支持这样的变化吗?”^[1]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则从第三世界的角度对欧洲的特产——人文主义——进行清算。他认为,欧洲的人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孪生兄弟。人文主义希冀看到同一性的欲望使得它到处扩张,在世界各地制造同一性。尽管人文主义在20世纪不断借尸还魂,以各种面目出现,如新人文主义(New Humanism)、天主教人文主义(Catholic Humanism)、社会主义人文主义(Socialist Humanism)、自然主义人文主义(Naturalistic Humanism),甚至生态人文主义(Ecological Humanism),可是思想界从来没有停止对人文主义的讨伐。恩斯特·弗里德里希·舒马赫(Ernst Friedrich Schumacher)认为,人们对现代人的那种无所不能的信仰摇摇欲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现代实验失败了。人不是“上帝”。继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上帝之死”以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宣布了“人之死”。福柯声称:“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对人类知识而言,人既不是最古老的问题,也不是最恒定的问题……正如我们的知识考古学所表明,人不过是一个近期的发明。这个发明或许临近尾声。”^[2]在后学时代人文主义又在伺机复活,即以以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的名义出现。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却评论道:“现在,后人文主义也许会被看做是可疑的新词,新出炉的口号,或者干脆是又一个人类不断自我仇恨的形象。然而,后人文主义或许也暗示着我们文化的一项潜能,一个倾向。这个倾向正力争变成一个大的潮流……我们需要明白,500年的人文主义也许正在寿终正寝,它正在脱胎换骨,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把它叫作后人文主义。”^[3]人类究竟是否需要哈桑所预言的“后人文主义”文化?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近30多年的事实证明,这种后人文主义文化纯属子虚乌有。沿着人文主义的老路走,人类找不到法农所说的“新的方向”,因为人文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难以分割。^[4]

“自然的终结”并不意味着自然规律已经不起作用、不复存在。人干扰了纯自然的变化,不等于自然规律已经不存在或不起作用。自然终究无法终结,可能终结的只能是人类和人文主义。而化解“自然的终结”和“人文主义的终结”的问题只能回到人类文化方面。由于“自然的终结”的重要表现是自然与文化内在地成为一个问题性的共同体,纯粹的自然与纯粹的文化都已不再存在,而自然又不可能被终结,可以做出调整的只能

是人类文化。贝克指出：“古典工业社会的概念基于自然和社会的对立，风险社会的概念则从被文化整合了的‘自然’的观点出发。”“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自然既不是给定的也不是可归因的，而是变成了一个历史的产物，文化世界的内部陈设。”“如果‘自然的’意味着各行其是的自然，那么它的一分一毫都不再是‘自然的’。”“自然史正在结束，但历史的历史刚刚开始。在自然终结之后，历史、社会、自然，或无论过度庞大的野兽被称作什么，最终都可归结为人类的历史。”^[1]“自然的终结”要求人类在把握人与自然关系时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化。麦克基本、科赫侧重于对“自然的终结”本身是什么进行问题呈现，注重从伦理、道德、心理层面对“自然的终结”所导致的问题进行实证性揭示，代表了这样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指向。生态学向人类生态学或文化生态学发展也遵循这样的理路。贝克曾说：“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自然就是社会而社会也是‘自然’。”^[2]或许可以进一步说，自然就是文化而文化也是自然。正是自然与文化的问题性统一，使自然与文化都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基础。一方面，自然受到文化的强大影响；另一方面，文化越来越多地受到自然的制约。它们共构为“文化生态”问题。因此“文化生态学”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人与自然的的关系由于人的实践能力的增加出现了新特点、新问题，不等于人与自然关系出现的问题具有绝对的不确定性，不等于人不可能对人与自然的新关系进行规律性把握。如果说，在现代性条件下事物、世界发展的趋势与前现代性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这种变化不是指规律已经不复存在，而是指规律的“构成结构”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人类面对的规律是纯客观规律，人类的实践目的是把握这种“无人干扰情况下的纯客体”规律，那么，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现代性条件下，人类需要着力把握的则是“有人参与的、主体与客观相互作用”意义上的规律。也就是说，在现代性条件下，虽然人类所面对的规律的构成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无论如何，规律都仍然存在。^[3]这正是文化生态学所要发现和解决的问题。

从物质时空载体方面来说，导致“自然界的终结”的强大工具是现代城市。如果说农村或传统城市尚未脱却完全自然的脐带，那么现代城市则是一个完全的自然异类。这个异类不仅性质与自然相反对，而且完全靠榨取自然的负熵而存活、扩张。“自然界的终结”的另一方，正是现代城市的崛起。现代城市是人口增长极、工业增长极、污染增长极，而它则是人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一种极致。现代城市几乎是现代一切危机和风险输出的源泉，它不仅使所在地的自然终结，而且大容量输出高熵使整个地球

^[1]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何博闻
译，译林出版社，2004
年，第98、97、99、140
页。

^[2]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何博闻
译，译林出版社，2004
年，第98页。

^[3] 陈忠：《风险社会与“自然的终结”：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本体论问题”与“历史超越”》，《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走向死寂。伴随着生态危机的发生，现代城市文化正在不断失去合理性，面临存在的危机。不过，现代城市也是公民（市民）社会和公民（市民）文化发生的地方。在现代科学技术兴起以前，传统城市没有能力迅速、大规模地造就全球生态危机，因而未必依靠人类的理性自制也可以防止“自然界的终结”。而在科学技术足以能发动一场毁灭自然生态系统的现时代，就不能不依靠人类的自制机制来加以防范。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解决现代城市危机的是城市人自己，而这个城市人是公民社会。在这种意义上，“城市”与“文化”和“生态”共同连接为“城市文化生态”，它们共同构成当今世界的基本问题。这正是城市文化生态学所研究的对象。理查德·瑞吉斯特（Richard Register）将代表未来的生态城市的标准归纳为3点：生命、美和公平。他认为，“生态城市建设的目的是为了给保护、探究和抚育地球上的各种生命的活动提供服务。因此，生态城市建设必须确立两大目标：一是提供一个健康的、可以让人创业的、美丽的环境；二是满足人类个人和集体的需求与愿望的功能。另外，城市美学方面的特征也是非常重要的，她的感染力与风格、她的建造房屋的方式、她的街道和运输系统的建设形态、她与自然及人工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实现城市功能的各种方式。最后，城市还需要保证公平，即保证公正广布人间，同时需给予市民最充分的机会去选择、去创造，以充分地满足个性和发挥个人潜能的方式生活。”^[1]这个简单的标准大致表达了城市文化生态学追求的目标。

本书的写作得到浙江图书馆、杭州图书馆和徐晓军先生、褚树青先生、周航先生、朱克勤女士、王天美女士的帮助，特此表示感谢！

^[1]理查德·瑞吉斯特：《生态城市伯克利：为一个健康的未来建设城市》，沈清基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目 录

序 言	自然的终结、人文主义的终结与城市文化生态学	i
第一章	文化生态学的城市研究转向与城市文化的生态学转向	1
一、	文化生态学的发生及其城市研究转向	1
二、	城市设计中的生态意识发展	6
三、	城市文化生态学的有机性重构	11
第二章	城市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纲领	23
一、	城市生态巨系统与城市文化生态学研究范例	23
二、	城市文化生态学的基本范式和内核	29
三、	城市文化生态学的科学研究纲领	37
第三章	城市文化生态系统论	49
一、	信息编码与城市文化生态学	49
二、	协同进化与城市文化生态学	57
三、	文化突变与城市文化生态学	67
四、	博弈均衡与城市文化生态学	73
第四章	城市文化生态学存在论	81
一、	“我在故我思”与城市的观念性存在	81
二、	生态神论与城市的自然性存在	89
三、	生态诗学与城市的艺术性存在	97
第五章	城市文化生态学价值论	107

一、城市文化生态学与城市精神	107
二、生态批评与城市文化自觉	114
三、生态资本与新生态主义	120
第六章 城市文化生态学经济论	129
一、演化经济学与城市文化生态学	129
二、创意经济学与城市美学经济	136
三、跨时空生态消费与城市生活美学	143
第七章 城市文化生态学实践论	151
一、生态实践理性与城市目的论	151
二、生态政治与城市文化生态学	159
三、生态法意与城市法美学	170
第八章 生态城市美育论	177
一、生态自我实现与城市生态审美人格	177
二、生态美育与代际城市文化生态	188
三、公民社会与城市生态民主	196
主要参考文献	203

第一章 文化生态学的城市研究转向与城市文化的生态学转向

一、文化生态学的发生及其城市研究转向

文化生态学 (Cultural Ecology) 又称生态人类学 (Ecologic Anthropology), 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 它研究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是将文化学的方法运用于生态研究的交叉学科。随着全球生态危机日益加剧, 许多学者认为生态学必须从多学科综合的角度进行研究。从人类学方面来说, 大致可分为研究社会文化为主的文化人类学和研究社会生态为主的生态人类学。^[1]而人类学的生态研究又分为两类: 一种是决定论的, 另一种是互动论的。决定论有两种极端的观点, 一是文化决定论, 另一是环境决定论。而事实上文化与环境是互动的, 有些情况下文化会比较重要, 而另一些情况之下则由环境主导。互动论被看做是介于环境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之间的交叉理论, 文化生态学是基于这种互动论而产生的。

最初的文化生态学是作为美国人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出现的, 主要引用人类学和生态学方法, 是一种文化人类学 (Cultural Anthropology)。当时的重要学者主要致力于研究北美土著文化, 通过所谓的“文化区” (Culture Areas) 研究文化变迁的一般理论。这些人类学家深受进化论、功能主义和环境决定论的影响, 同时也受到有关“超有机体的”文化特征和文化传播等多种思潮的影响。其中对文化与环境的关系进行了论证并对后来的几代人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类学家如弗朗兹·博厄斯 (Franz Boas) 和阿尔弗雷德·路易斯·克罗伯 (Alfred Louis Kroeber), 采取了一种环境可能主义的立场, 认为自然环境提供的是可供选择

^[1]田中二郎:《生态人类学》, 宋建华译,《世界民族》, 1985年第3期。

的机会，由文化历史和特殊习俗等组成的文化决定文化对环境适应的方式，环境与文化是一种互动与辩证的关系。1955年，著名新进化论者朱利安·海恩斯·斯图尔德（Julian Haynes Steward）出版《文化变迁的理论：多线性变革的方法》一书，最早使用“文化生态学”概念，并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建构，被普遍认为是文化生态学正式诞生的标志。斯图尔德认为文化生态学主要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的一种学说。其核心观点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1）文化人类学的中心任务是发现随着时间推移而呈现出来的世界文化发展的规律，并从因果关系方面加以解释。

（2）每一种文化内部都有一种最重要的功能，它是该文化系统或文化类型的决定因素。对此可以用“文化核心”和“次级特征”的概念来加以界定。（3）文化人类学过去只从事简单社会的研究，而现在必须逐步开始对复杂社会进行分析。从斯图尔德的观点可以看出，他研究的兴趣并不在于为文化生态学下一个定义，而在于了解文化“变迁”的过程和原因。在斯图尔德看来，人类是一定环境中总生命网的一部分或亚社会层，但其引进了文化因素。生物层与文化层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存在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不仅影响人类一般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影响文化的产生和形成，并发展为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文化不是经济活动的直接产物。山川、河流、海洋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不同民族的居住地和环境、先前的社会观念、现实生活中流行的新观念以及社会或社区的特殊发展趋势等，都给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场合和情境。斯图尔德把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定义为真正整合的方法，认为如果孤立地考虑人口、居住模式、亲属关系结构、土地占有形式及使用制度、技术等文化因素，就不能掌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及与环境的联系；只有把各种复杂因素联系在一起，进行整合研究，才能弄清楚环境诸因素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才能说明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怎样受制于环境。作为克罗伯的学生，斯图尔德曾研究美国西南部土著人群体，并提出应集中研究“文化内核”，即文化中与自然界关系最直接的部分——生存或生产策略。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内核（生存方式）因其所利用的特定或“有效”环境（土壤、气候等）而发展，又反过来促使其他文化特征（社会组织）形成。按照这一“文化内核”的思想，环境和文化在形成文化变迁的过程中有着互动作用。斯图尔德从一种可能主义的观点出发，试图解释面对历史和环境提供的选择机会文化如何作出选择，强调在文化变迁中生态因素尽管不是唯一也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他认为文化生态学就是要研究环境对文化的影响，特殊类型的生态决定了作为文化载体的人的特征。研究范围包括三方面，即技术或工具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技术与人的行为方式之间的关系、行为方式对文化其他方面的影响。例如他曾指出，在旱区，人们对于降雨形式的极大关注意味着它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中心内容，并导致形成一种极度突出降雨和水的宗教信仰体系，而这样的信仰体系在一个风调雨顺或实行灌溉的社会中却不大可能出现。

20世纪60年代末,第一代受斯图尔德影响的人类学家发表了3部重要的文化生态学著作,即罗伯特·McC. 内廷(Robert McC. Netting)的《尼日利亚的农民:乔斯高原科非亚民族的文化生态》、罗伊·A. 拉帕波特(Roy A. Rappaport)的《献给祖先的猪:新几内亚人的生态祭祀仪式》和约翰·W. 本奈特(John W. Bennett)的《北原居民:适应战略和农村生活》。其中最著名的是拉帕波特的《献给祖先的猪:新几内亚人的生态祭祀仪式》,它被视为文化生态学分析的典范。斯图尔德对文化生态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一是强调过程研究,沿用进化生物学的思路。他的许多学术用语如“适应”等即来自进化生物学。这些概念的使用又促使其他生物学概念如“生态龕”的借用。二是努力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融合。如通过保留文化—环境链的选择性思想,将罗伯特·金·莫顿(Robert King Merton)的中程理论(The Middle-Range Theory)引进文化生态学。三是集中研究具体文化,而且经常集中研究某一具体环境中文化的某一具体方面(如生产制度)。如注重研究所谓“自动平衡”的背景。在这一背景中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或多或少是平衡的。四是集中研究农村环境,较少关注城市环境。^[1]

早期文化生态学研究较为粗浅,研究范围较为狭窄,尤其是对工业化、城市化或人类文化的异化估计不足,因此存在较多问题。一是研究对象通常局限于“小型地区”,尤其是局限于农村环境,得出的结论可能不适用于较大地区。作为当今生态问题焦点所在的城市未被其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来关注,因此解决全球生态问题的潜在价值无法发挥。二是未能充分考虑人或文化对环境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应被视为一个相互依存的自然—人类系统的组成部分。文化生态学强调“文化适应”,但人类并非环境的奴隶,而是对环境有主动作用。这种作用可以是适度的,也可能是过度的。三是对过去历史的研究较多,对当今生态环境的变迁则未作系统研究。学术界多注重利用史学研究成果(如文献、考古学著作或简单的口述历史等资源)来说明过去的状况,如史前的灌溉系统、非洲农村生活在若干个世纪内的变化等,近几个世纪以来发生的生态环境剧变却未被当做中心问题来研究。总体而言,早期文化生态学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农村文化生态学。

现代城市自工业革命兴起以来成为经济的增长极,在提升人类福利的同时也空前激化城市内部的矛盾以及与外部的矛盾。其中生态问题最为尖锐,在当今已构成难以克服的危机,给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自然界带来十分严重的存在性威胁。城市人口的高集聚和污染高排放造成全球生态环境全面、深度的不可逆破坏,城市规模的扩张更是直接破坏土壤和水环境。目前全球城市面积约占陆地面积的2%,但其财富产出与废弃物排放都占全球总量的70%—80%。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大气化学家保罗·约泽夫·克鲁岑(Paul Jozef Crutzen)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正式提出“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以说明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已上升到与冰河作用、小行星撞击地球等最强大的宇宙

^[1]黄育馥:《20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